

《周恩来风采》丛书



折冲樽俎

周恩来与国共谈判

王静 著

重庆出版社



折 冲 樽 俎

——周恩来与国共谈判

王 静 著

重 庆 出 版 社

1998 年·重庆

责任编辑 周世慧
封面设计 王 多
技术设计 刘黎东

王 静 著

折冲樽俎——周恩来与国共谈判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外语学院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5 插页 4 字数 384 千

1998 年 2 月第一版 1998 年 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66-3885-X/K·203

定价:18.00 元

内 容 提 要

周恩来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在他那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斗争生涯中,长达10年的国共谈判的经历,构成了他独特的人生风景线。

自1935年底蒋介石被迫摇起橄榄枝与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中共秘密接触,到1946年4月离渝赴宁继续谈判已达10年之久。在这漫长的谈判岁月里,周恩来奉中共之命,主持国共谈判,先是逼蒋走上抗日的道路,继而为维持两党团结抗战的局面而折冲樽俎;好不容易赢得了抗日的胜利,蒋介石又布下内战的乌云,只好连续作战,再为遏止内战而奔走呼号,争取和平建国的那一天。十年辛苦不寻常!

本书作者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以周恩来的活动为主线,以国共谈判为背景,系统地探讨周恩来在国共谈判中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所得所失,尽可能全景式地再现当年国共谈判中唇枪舌剑的精彩场面,使人们在增长历史知识的同时,从中领悟出周恩来那相忍为国、自我牺牲、严密细致、实事求是的革命精神和待人以诚、立言于信、服人以理、不卑不亢的崇高品质。

该书资料翔实,文笔生动,融可读性与学术性于一体,相信读者会喜欢它的。

出版说明

为了纪念周恩来诞辰 100 周年,我社组织了一套《周恩来风采》丛书,从周恩来与国共谈判、周恩来与共产国际、周恩来与中国外交、周恩来与中日关系等四个方面来展现周恩来在处理党与党之间、国与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所表现出的折冲樽俎、巧解矛盾、深谋远虑、以民促官的伟人风采。这套丛书有如下特点:

1. 选材独特。当年中共与国民党、与共产国际;新中国外交、中日关系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周恩来用他那超人的智慧和非凡的毅力较好地处理好了这些关系,为党和国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这几方面的内容也是关于周恩来生平事迹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为此,我们做了一些探索和努力。

2. 作者队伍强。作者是长期从事有关方面学习和研究的专家学者,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是他们多年心血的结晶。

3. 融史料性与可读性为一体。由于作者充分占有现有资料,在写作中力图真实再现当年的情景,使这套丛书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同时,史与论的有机结合,娓娓道来,使该丛书有较强的可读性。

经过作者和编者的努力,这套丛书终于与读者见面了,望朋友

们能接纳它,同时,我们更希望它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出更多的精品之作来,使有关周恩来的研究更加深入。

编者

1997 年 12 月

目 录

第一章 走上谈判之路	(1)
一 外敌入侵与谈判缘起	(1)
二 当年和谈主持人	(5)
三 对话渠道的打通	(10)
四 高层会晤的酝酿	(17)
五 “恩来事忙,暂难出去”	(26)
六 华清池畔的特殊会见	(34)
第二章 促成国共合作	(48)
一 一波三折的西安谈判	(48)
二 愉快的杭州之行	(58)
三 一上庐山	(64)
四 再上庐山	(70)
五 促成合作的南京会谈	(80)
第三章 坚持团结抗战	(92)
一 谈不通的“大党”方案	(92)
二 磨擦声中的划界谈判	(109)
三 “真正的劲敌与攻不开的堡垒”	(128)
第四章 重开谈判之门	(155)

一	“与蒋会面尚非其时”	(155)
二	重在缓和关系	(165)
三	谈判成了宣传战	(175)
第五章	主张联合政府	(188)
一	“一新天下之耳目”的主张	(188)
二	欢迎美国人的介入	(195)
三	合情合理的《延安协定》	(203)
四	拒绝参加“请客式政府”	(213)
五	究竟是谁“捉弄了”谁?	(223)
六	仁至义尽的最后努力	(229)
第六章	争取和平建国	(239)
一	陪同毛泽东赴重庆	(239)
二	艰难的讨价还价	(247)
三	边打边谈	(263)
四	和平之光的再现	(271)
五	政协会上的折冲	(283)
六	意想不到的《整军方案》	(292)
第七章	制止干戈再起	(304)
一	军事三人小组万里行	(304)
二	昙花一现的“和平民主新阶段”	(311)
三	东北火药桶	(320)
四	一纸空文的东北停战协定	(333)
五	中原危机与东北大打	(347)
六	“竭力争和平,哪怕短时期也好”	(362)
第八章	戳穿和谈烟幕	(377)
一	五人会议的流产	(377)

二	美国调处名存实亡	(386)
三	“美国骗局再也继续不了”	(394)
四	“完成教育人民的一课”	(419)
第九章	主持北平和谈	(437)
一	战犯求和	(437)
二	“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	(442)
三	当年和谈之新姿	(452)
四	众所周知的结局	(460)

第一章 走上谈判之路

国共谈判缘起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人侵和中华民族危机的深重，其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1935年底。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作为国共合作政策的参与制定者、大力倡导者和积极推动者，他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国共两党的秘密接触，并在双方磋商息争御侮办法的艰难对话中，逐步走到了国共谈判舞台的中心，从而开始了他那漫长的谈判生涯。

一 外敌入侵与谈判缘起

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治舞台上最有影响力的两大政党。“中国的革命，自从1924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①

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曾携手北伐，打倒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合作岁月。但好景不长。由于蒋介石中途背叛革命，国共两党在1927年就分道扬镳了。从那时起，战场上的厮杀便成了双方在历史舞台上角逐较量的主要方式。

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

入侵,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亡国灭种的危险日益严峻地摆到了中国人民的面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首由田汉作词、经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喊出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

民族危机的深重给正在硝烟弥漫的内战战场上进行着生死角逐的国共两党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入侵和中国人民被迫发出的最后吼声,是继续内战自毁长城呢,还是合作抗日拯救人民于水火?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危急的形势迫切要求国共两党作出各自的回答。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入侵,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的要求,毫不犹豫地举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并毅然捐弃前嫌,向国民党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吁。早在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就为九·一八事变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明确指出其实质是企图把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旗帜鲜明地号召“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行动起来,“一致反对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②1933年1月17日,中共中央又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发表宣言,表示愿在下列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③1935年华北危机加深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指出中华民族正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强调“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

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并郑重表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红军的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号召建立“国防政府”,组织“抗日联军”,实施“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④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规定党的任务是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即“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统一战线上去。”⑤

中国共产党深明民族大义的主张,赢得了中国社会各界的热烈拥护,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产生了巨大反响。全国抗日救亡的浪潮,似长江之水,如黄河之流,汹涌澎湃,势不可挡。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国民党当局最初是持“攘外必先安内”的“绝对不抵抗”政策。但在中共强大的抗日舆论攻势和全国高涨的救亡图存热浪的推动与冲击下,国民党当局的对日态度也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无休止的入侵而悄悄地发生了变化。1935年11月19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大”上发表演说,声称“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这表明国民党当局对中日妥协仍抱有一定的幻想。但蒋紧接着又表示“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若到了和平绝望时期和牺牲的最后关头,他则“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

“既不敢自外，亦不甘自逸”，并将“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⑥蒋介石在国民党最高会议上作如此表示，说明他开始有了调整其一味妥协之对日政策的愿望。虽说这仅仅是火光一闪，但毕竟是对日抗争的表现。11月22日，国民党五大六次会议通过《在国难严重时期应集中一切力量充实国防建设案》；随后又设秘密机构于苏州“留园”，责成张治中负责，研讨“国防工程”与“民众组训”计划，从此，国防工事的构筑工作在全国各战略区和战略要点“全面展开”。^⑦12月1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改组行政院，各部、会、署换上了英美派人选，蒋介石本人也取代汪精卫兼任行政院长，并任命冯玉祥等为军委会副委员长。这表明亲日派在南京政府中的地位大大下降。1936年1月，日本外相公开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所谓“广田三原则”，对此，蒋介石后来写道：“当时的情势是很明白的，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⑧由此看来，国民党当局真的是有了对日抗争的要求和思想准备。尽管这种要求并不强烈，其思想准备也很不充分。

“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⑨1935年12月19日，蒋介石在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会见时表示，他绝不反对共产党的存在，认为中共像其他政党一样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既然它以推翻政府相号召，他只好采取严厉措施，对此，他表示遗憾。在会见中，蒋介石对苏联支持中国统一的立场表示赞赏，并说，如果苏联政府能够促进国共团结，他将很高兴。1936年1月22日，蒋介石又向鲍格莫洛夫进一步表示，说“可以在下列基础上同中共达成协议：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及司令部的权威，同时保留其现有编制，参加抗日战争”。^⑩虽说蒋介石是出于调整中苏关系的需要才作上述政治解

决中共问题的表示的,但苏联所流露出的对国共问题的关心,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而强烈地刺激着他去更加积极地寻求改善国共关系的途径。为此,他放弃了单纯的“剿共”政策,代之以“围剿”与“谈判”双管齐下的对共政策。这就为国共两党再谋合作提供了可能。

既然国共两党在抗日问题上找到了共同点,而彼此间又有了息争御侮的初步合作愿望,那么,在民族危急关头探求再度合作的可能性也就势在必行了。

二 当年和谈主持人

虽说国共两党在民族存亡之秋都萌发了再度合作的念头,但由于双方当时正处于严重敌对的战争状态,除战场上的厮杀外几乎毫无接触,所以一时尚难以直接磋商合作。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首先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陕北周围的东北军,决定从争取东北军入手,打开团结抗战的新局面。为此,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后专门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该委员会书记,具体负责对东北军的工作。自此以后,周恩来为倡导国共合作,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从而成为当年国共和谈的主持人。

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首先从高福源身上找到了突破口。高福源是东北军的一位团长,1935年10月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通过参观学习,其思想发生了变化,由衷地赞同中共的抗日主张,他自告奋勇地愿做沟通红军与东北军关系的使者。周恩来从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处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当即决定利用高福源

的特殊身份,同意他回去做张学良的工作。在高临行前,周恩来还询问他回去后安全有无保证,并嘱其多谈“红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⑩

1936年初,高福源返回洛川东北军驻地,向张学良谈了他在苏区的见闻。张学良当场表示:“你谈得很好,休息一两天你赶快回去,请红军派一位代表来,我们正式商谈一下。”^⑪1月16日前后,高福源受张学良之托,到甘泉红军驻地邀请中共派正式代表赴洛川会谈。

1月19日,李克农在高福源的陪同下赴洛川,20日晚,与张学良进行了3个小时的会谈。21日,李克农自洛川致电周恩来等,汇报从会谈中了解到的情况:张学良表示愿意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东北军中同情中共抗日主张者不乏其人,对“剿共”态度消沉,愿意目前各守原防,并在可能范围内恢复通商。

为了巩固和扩大这次会谈的成果,1月25日,周恩来与毛泽东、彭德怀等20位红军将领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揭露蒋介石打内战及排斥东北军的种种毒计,指出进攻苏区打红军是“绝路”一条,东北军“唯一的出路”是“抗日反蒋”;说明中共愿与任何抗日部队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并表示“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希望与东北军互派代表,“共同协商”关于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具体办法”。^⑫

为了加快同东北军合作抗日的步伐,中共中央决定再次派李克农赴洛川会谈。2月10日,周恩来在布置这次会谈时,对李克农说:“按目前形势,这次和张学良谈判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也有一定困难和危险。力争谈成,按瓦窑堡会议精

神谈。也可以按具体情况,先商谈局部合作抗日、经济通商等问题。重大问题及时请示中央。”^⑭2月20日,周恩来又向李克农传达了中共中央及军委的训令。“训令”充分估计了谈判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并详细提出了相应的对策。“训令”认为,张学良同意抗日,愿同中共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但不同意讨蒋;不反对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但不同意马上实行。为此,“训令”提出,这次谈判的策略是:处处把张学良和蒋介石分开;求得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坚持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坚持抗日与讨伐卖国贼不可分;要求停止内战,不拦阻全国红军集中河北,不反对红军充任抗日先遣队;原则不让步,但避免交涉破裂。次日,经周恩来安排,李克农与苏区贸易局局长钱之光、机要员戴镜元及高福源等一行6人,离开瓦窑堡前往洛川。

2月25日,李克农一行抵达洛川。由于张学良此时已去南京公干,李克农遂先同67军军长王以哲会谈,磋商红军与67军局部合作之问题。28日,双方达成互不侵犯、恢复通商等五项口头协议。3月3日,张学良返回西安,次日即飞洛川。他一见李克农便说:“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⑮意即“为了联共抗日,他把整个东北军和本人的命运,全部豁出去了”。^⑯为此,他除同意已达成的口头协议外,还希望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主要领导人会谈,径直磋商合作抗日大计,并说会谈时间由中共定,地点设在肤施城(即延安城)。张学良之所以作如此之请,正如他本人后来所说,“良当时不悉李克农为共党中何等人物”,故对“彼之地位,是否可能代表该党,表示怀疑”。^⑰

张学良的举动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3月16日,中共中央在东征前线石楼听取了李克农的汇报后,认为张学良是有抗日诚意的,遂决定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前往,并于当天致电王以哲

并转张学良，告以中央的上述决定。4月6日，毛泽东、彭德怀又致电王以哲并转张学良，告以周恩来的行期和联络办法，并提出如下所要商谈的问题，让张学良妥为考虑：(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2)全国红军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迈进问题；(3)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4)联合苏联及选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5)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经过充分的准备，周恩来于4月7日偕李克农等踏上了前往肤施谈判的征程。

4月8日，周恩来一行如约来到肤施城东北10公里处之川口，等待东北军派人引其入城。但因当时风雪交加，联系不上，会谈被迫推迟一天。次日上午，晴空万里，张学良亲自驾机飞抵肤施。下午8时，周恩来等进城。当晚，双方在清凉山下桥儿沟的一座天主教堂的小阁楼上作彻夜长谈。会谈是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甚至连每人一碗面的夜宵，也是由张学良的卫队长孙铭九送至教堂阁楼之窗口，然后再由王以哲接递进去的。这次会谈的气氛是友好的。在会谈中，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会谈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4时。临别时，张学良赠送给周恩来精密地图一册，并说：“共同保卫中国。”^⑩

这次会谈的结果是令人振奋的。据4月10日周恩来致中共中央电称，张学良在会谈中曾作如下表示：(1)完全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赞成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并认为这是“唯一出路”。(2)赞助红军集中河北，欢迎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并谓如红军与日军接触，则全国停战运动“更有力”。(3)蒋介石现在歧路上，虽不会彻底抗日但有可能争取与其合作；目前他尚做不到反蒋，如蒋降日，他当离开蒋；在他公开抗日之前，他不能不遵蒋令进驻苏区。(4)拟派代表赴苏联，中共方面的他负责护送至新疆。